

论亨利·瓦尔德对当代符号文化的批判*

朱鸿旭

摘要：作为罗马尼亚战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亨利·瓦尔德广泛吸收和借鉴了卡西尔、苏珊·朗格、亚当·沙夫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对当代符号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当代文化中语言符号的危机：一是非理性思潮对作为理性承载的语言符号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非理性主义将语言视为通向真理之途的障碍或遮蔽，试图超越或取消语言符号；二是大众媒介时代新的视听传播手段所构成的图像认知模式对语言符号的感知方式所形成的强烈冲击，使文字阅读让位于图像观看，思考臣服于感觉，深度感知被替代为平面感知；三是符号的空洞化和无限增殖导致了符号意义的丧失，符号日益沦为对当下世界的感性化的即时反应，从而可能退化为信号。他对当代文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亨利·瓦尔德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23CZW070），西华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核心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化中的非理性主义、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作为人类理性根基的语言符号面临着被取消和被替代的威胁，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批判精神与创造性思维的消泯，最可怕的不是机器超过人类，而是人类变成了机器。在他看来，语言符号始终是人类理性与情感相互融合的领域，语言符号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整体性生活的危机，走出这种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重新确立人的理性、情感、道德、审美之间更高层次的平衡。

关键词：语言符号；批判理论；符号学；大众媒介

作者简介：朱鸿旭，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电子邮箱：675218328@qq.com]

On Henri Wald's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Symbolic Culture

Zhu Hongxu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st-war new Marxist movement in Romania, Henri Wald extensively absorbed and borrowed the semiotic ideas of Ernst Cassirer, Susanne Langer, Adam

Schaff, and Roland Barthes, and deeply criticized contemporary symbolic culture. He summarized the crisis of language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questioning of the legitimacy of language symbols as rational carriers by irrational ideologies. Irrationalism views language as an obstacle or shield to the path to truth, attempting to surpass or eliminate language symbols. The second is the strong impact of the image cognitive model formed by the new audio-visual communication methods in the era of mass media on the perception of language symbols, which makes text reading give way to image viewing, thinking subject to sensation, and depth perception replaced by plane perception. The third is that the hollowing out and infinite proliferation of symbols have led to the loss of their meaning,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mediate response to the sensory perception of the current world, which may lead to the degradation of symbols into signals. He deeply reflected on the irrationalism, mass media, and consume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believing that language symbols, which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ationality, face the threat of cancellation and substitution. This also means the

disappearance of human critical spirit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e most frightening thing is not that machines surpass humans, but that humans become machines. In his view, linguistic symbols have always been a field where human reason and emotion blend together. The crisis of linguistic symbols is fundamentally a crisis of human holistic life. The fundamental way out of this crisis is to re-establish a higher-level balance between human reason, emotion, morality, and aesthetics.

Keywords: linguistic symbols; critical theory; semiotics; mass media

Author: Zhu Hongxu, Ph. D.,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aesth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Email: 675218328@qq.com]

作为罗马尼亚战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亨利·瓦尔德（Henri Wald，1920—2002）一直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号学和美学的开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亨利·瓦尔德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实践哲学为基石，深度介入了风行一时的欧洲现象学运动和结构主义思潮。60年代以后，亨利·瓦尔

德的学术兴趣逐渐从辩证逻辑理论转向语言学和符号学。他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苏珊·朗格 (Susanne Langer) 和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等人的符号学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和借鉴,以辩证逻辑为根基思考语言问题,同时融合了人道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超越了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观点的限制”^①,拓宽了符号美学的研究视域。本文从语言符号的合法性问题、媒介时代的符号危机以及语言符号的“信号化”等方面入手,对亨利·瓦尔德的符号文化批判思想进行解读和分析,进而总结其对当代文化重构的启示意义。

一、非理性主义思潮下语言符号的合法性危机

20世纪以来,从现象学运动到存在主义思潮,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到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不断有思想家向人类理性大厦发起攻击,而语言符号则始终寓于人类理性的中心,成为攻击的焦点。瓦尔德将20世纪的

^① 傅其林:《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非理性主义称为“主体对客体的复仇”^①，在他看来，这股思潮并非凭空而起，其先驱和前奏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下半叶“后黑格尔时代”的思想家对理性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哲学以批判黑格尔的客观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为起点，他反对理性对个体的压制，主张从个体的孤独、绝望和悲观出发，抛开世界的非人特征，重新恢复人与世界的牵涉。站在反对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克尔凯郭尔对语言媒介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在语言中，‘那感官性的’作为媒介是被贬为纯粹的工具，并且不断地被否定。”^②而在音乐、雕塑和绘画中，感官性直接参与了精神活动，并未被取消，而是作为最基础的媒介要素。因此他认为，语言符号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性精神的结晶是一个被削减、被压抑后的产物，因而语言成为一种反讽，他借用一句名言说：“人有语言不是为了揭示思想，而是为了掩盖思想。”^③同样，尼采也对语言所携带的理性精神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庸人总是以理性语言掩盖世界的“力”

① Henri Wald, “Mass Media And Creative Thinking”, eds. Edward D. Angelo and David H. DeGroot *Contemporary East European Marxism*, Amsterdam: B. R. Grüner Publishing Co, 1980. pp. 29-38.

②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一个生命的残片》（上册），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1 页。

③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8 页。

的本质，把权力意志与其外在表现分开来，并假借理性语言及其所蕴含的道德观将权力意志想象为“主体”的运作，而实际上，权力意志是直接的征服欲、统治欲的表现，“只有在语言的迷惑下（理性语言对事物的表述是僵死的，是彻底的谬误），这种力才会显示为其它”^①。尼采不仅以权力意志作为驱动世界发展的非理性力量，而且对理性语言的虚伪性进行了批判。

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已经包含着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对语言符号合法性的质疑，而到了 20 世纪，人们目睹了战争、屠杀和暴力在精确计算、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杀戮与工具理性竟能并行不悖，统计学、人种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将个体的人简化为可以计量和统一管理的数字。正如瓦尔德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萧条导致了对普遍性的不信任和对结构的偶像崇拜。”^② 人们渴望对人本身的幽深与黑暗有更多的认识，发掘在理性和语言符号遮蔽下丰富的非理性世界。这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

20 世纪初最先对语言符号的理性精神发起强烈冲击

^① [德]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41 页。

^② Henri Wald, *Homo Significans*,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1970, p. 52.

的是柏格森的生命美学。柏格森认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世界永恒地在这种生命的绵延中生生不息。个体生命无法以理性去理解和获得世界的本质，只能通过自我生命的流动与世界保持和谐一致。但是，语言的理性功能却总是寻求将短暂的瞬间固定化，将变动的感受凝结为静止的。“我们本能地倾向于把我们的种种印象固化，就是为了用语言表达它们。”^①因而理性和语言构成了对生命运动的阻碍。现象学同样对语言符号的理性价值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胡塞尔将意义放在优先于语言的地位，意义的显现是第一性的，而语言不过是一个命名活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虽然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他同样认为存在是优先于语言的，真理无法言说，语言不是被人说，而是语言在言说自身。德里达在批判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用“延异”和“撒播”等概念阐明符号意指活动的滑动性和开放性，从而以语言游戏替代了索绪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语言观。在现象学之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挖掘出另一个非理性的潜意识世界，在这个世界面前，语言及其承载的理性世界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也从另一个方向对理性主义的语言符号观构成了威胁。

^① [法] 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冯怀信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105页。

语言符号与理性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一旦理性失去了合法性，语言符号便成为一堆没有意义的能指。美国思想家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说：“我们的理性主义是一种符号理性主义。”^①当代文化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排斥必然将语言符号推上审判台。虽然所有的反对声音也是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出现的（这正是其矛盾之处），但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人可以绕过语言，直接与本质联系在一起，这就对语言符号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面对语言符号的合法性危机，瓦尔德首先给予了坚决的批驳。在他看来，即便最低水平的语言符号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理性价值，取消语言符号的理性价值无异于取消语言本身。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一些走入极端的现代主义实验小说完全成了文字的无意义堆砌，就是这一悖论的体现：语言存在于那里的意义正是要展现语言的无意义。而放眼整个文明史，亨利·瓦尔德看到，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和文字的产生，语言的理性功能持续扩大，基于语言符号的人类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得以建立，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合作、理解和沟通得以可能。因为对语言符号的理性应用意味着祛除语言

^① [美] 雅各布·克莱因：《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3 页。

中的个体性特征，用一种抽象和概括的方法表达事物的同一性和个体事物背后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与这种抽象能力和符号化的过程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符号代表着人的理性精神，语言符号的运用推动着理性思想的不断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语言与理性的关系并不是排他的，而是与情感、伦理等价值共存，并与这些价值、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语言和意识中的非理性精神的强调并不一定要以消灭和摒除理性精神为前提。未来的语言符号的发展应该是以理性精神与情感之间更高层次的平衡为基础的，“必须既反对理性过度损害感性，又反对感性过度损害理性……人的两个方面都必须受到教育。理性活动的进步必须与情感生活的进步相平衡。”^① 在理性价值遭到质疑的今天，语言符号的合法性依然不容侵犯，但是，只有通过辩证的否定，把语言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重新统合起来，非理性主义思潮所提出的合理要求才可能被正确地吸收，语言符号的当代危机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二、大众媒介时代的符号文化批判

20 世纪，广播和电视的大规模普及使人类的信息传

^① Henri Wald, *Limbaș Și Valoare*,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1973, p. 24.

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时代正式到来。大众媒介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符号的面貌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1964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对方兴未艾的大众媒介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为大众媒介的兴起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和美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克卢汉热情拥抱新的大众媒介带来的人的重新部落化。他的乐观主义态度反映了当时大众媒介的急剧扩张态势，成为新的视听媒体借以颠覆语言文字和阅读行为的宣言。但瓦尔德对此提出了怀疑，他认为，图像传递信息的方式是空间性的，信息在空间范围内延展开来，这和言语、文字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文字，我们在“读”；而对于图画，我们在“看”。文字符号与语音符号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性，文字始终被瓦尔德视为语音的“转录”（transcribe）。而图像符号则不同，图像中包含着色彩、形状和线条等密集的个体性特征，每一个图像都是无数个性化的感官印迹的集合，都包含着海量的感官经验。文字的抽象性推动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而海量的感官信息只能淹没人的感知系统，不能将信息转化为思想。

在麦克卢汉看来：“拼音字母和数字是最使人分割

和非部落化的媒介。”^① 它把每个人变成了独立和不相关的个体，使理性不断膨胀并削弱了人的感性。而大众媒介重新激活了视听媒介的感官性，允许人们整体性地参与世界，获得更加丰富而全面的感知体验，从而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部落化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但瓦尔德认为，麦克卢汉的这种乡愁式的乌托邦理想不过是卢梭思想的死灰复燃，卢梭认为文字阉割了语言，“文字以精确性取代了表现力”^②。这在启蒙时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已经无法回应当今时代大众媒介统御一切文化的现实了。大众媒介造成了人类对文字符号的轻视和冷落，同时也贬抑了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二者相互影响，其结果是文字符号日益退出人的智性生活，这对于大众来说是一种文化的堕落，而对于文字符号和阅读行为来说则意味着一种被取代、被放弃的威胁。在瓦尔德眼中，阅读是一项需要大量智力投入的语言运用活动。“阅读只不过是听一段独白：字符的视觉效果转化为内心话语的听觉效果。通过使交流在没有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情况下都成为可能，印刷的字母文字刺激了智力的倾

① [加]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8 页。

② [法] 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 页。

向，即概括而忽略感性的倾向。”^① 阅读不单是一种内心活动，而且是循着语言与理性的先导，与原作者的思想进行的对话与交流。瓦尔德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力正是来源于阅读、教育、沉思和交流，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人通过自身的理性思维能力对有限的信息进行组织和整合，产生新的知识和价值。“人是物质组织中唯一一个输出信息多于输入信息的系统，因此人是负熵的永久来源。他以其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通过加强组织来反对无组织，通过丰富分化的过程来反对同一化。”^② 这种创造性力量的发挥离不开符号，因为只有符号能够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能够以语法规则保障思维的合逻辑性，能够提供隐喻、范畴、定义等思想形成必不可少的要件。

瓦尔德认为，大众媒介对公众的符号感知产生了四个方面的消极影响：

第一，深度的消失和平面感知的扩大。毫无疑问，直播能够让我们看到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了解外在世界的各种奇观，但是这只意味着世界在平面维度的扩展，却并不能展示世界的“深度”之维。世界的“深度”之维包括事物的同一性、本质与规律、

^① Henri Wald, *Homo Significans*,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1970, p. 65.

^② Henri Wald, “Structure, Structural, Structuralism”, *Diogenes*, Vol. 17, No. 66, 1969, pp. 15-24.

范畴与关系等，它们不是自然本身就有的，而是人的意识构建的结果，比如质点、匀速运动、等价劳动等，这类事物和关系更适合用语言文字而非图像来表示。图像符号更适合表现自然事物的多样性和感官特性，如形状、色彩、动作等。电视媒介对世界的呈现必然以其所擅长感官性和多样性为基础，而这就造成了公众对事物的平面化感知强化和深度感知能力减弱。“由此，世界的‘深度’之维失掉了，‘深度’之维要求人的思考，而仅存的表面性维度只要求人们‘凝视’。”^①在瓦尔德的语境中，与凝视相对的是思考。凝视是在无限繁杂的物象和信号中艰难地保持聚焦，是由眼入心的情感刺激，是一种摒弃思考和批判的冷漠姿态。

第二，观众通过语言符号与作者之间的交流被切除，沦为符号接收的机器。面对海量信息的轰炸，观众不再能够进行有效的甄别和提取，而是被动地“照单全收”。在电视机面前，信息轰炸阻断了冷静思考的进程，人的大脑不断处理着倏忽而逝的信息流，而实际上真正留存其四中的却很少。换句话说，在观看电视节目时，大脑的语言符号处理功能和思考空间是处于闲置状态

^① Henri Wald, "Mass Media And Creative Thinking", eds. Edward D. Angelo and David H. DeGrood, *Contemporary East European Marxism*, Amsterdam: B. R. Grüner Publishing Co., 1980, pp. 29-38.

的，支持大脑运转的能量被分配到接收海量信息的工作区域中去，从而造成了符号感知中图像感知的敏感和语言符号感知的麻木。

第三，符号感知的单一化和同质化。瓦尔德说：“视听大众文化再次产生了一个整体性的，共时性的和万花筒式的世界观。”^① 电视传播的图像符号突破了语言的差异性，它要求观众以同样的感知模式去接受，要求世界各地的观众在同一时刻守在电视机前，以同样快速和整体性的方式感知信息。正如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它（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中，最重大、最深刻的便是依据一个严格规定的时间表，将众人的生活同时予以私人化与固定化。”^② 最终，这种统一的要求转变为对视听语言的同一性感知，这与文字符号感知的自由性和个体性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对符号的情感感知压倒了理性的思考，导致了人们在思想上的懒惰和批判能力的丧失。图像符号所

^① Henri Wald, “Mass Media And Creative Thinking”, eds. Edward D. Angelo and David H. DeGrood, *Contemporary East European Marxism*, Amsterdam: B. R. Grüner Publishing Co., 1980, pp. 29-38.

^② [英]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46页。

展现的万花筒式的世界景象既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也引诱观众停留于这种感官享受而忽视了由现象深入本质的认识途径。理性思维是一种艰辛的劳作，是感官经验的提纯，是归纳和概括，是新思想的生产过程。而感官层面的感知却是一种无需付出大量精力的行为，任凭信号在人的感知器官中流动。感官经验最终不是归为理性的分析，而是变成情感的扰动，因而它也成为意识形态操控的手段，种种关于权力、关于自我、关于服从的观念通过感官—情感的通道深入人的意识或潜意识，塑造并规训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显然，针对大众媒介对人的感官经验的恢复，瓦尔德与麦克卢汉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瓦尔德站在创造性思维的立场上，激烈地反对感性的膨胀对理性思维的压抑，对语言文字符号的衰落感到忧虑。符号是人创造的，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保持符号的隐喻能量，不断刷新符号的表意功能，而当人们习惯于电视媒介，满足于图像符号的表意模式，语言文字符号就面临着消失的威胁。瓦尔德尖锐地指出：“无论媒体传达的信息多么宝贵，它们都无法扭转信息标准化和创造性思维被削弱的趋势，等待信息的人的数量不能影响信息本身的质

量。”^① 他反对将信息与意义混为一谈，反对将原始神话与现代神话不加区别地看待。在他看来，信息数量与规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意义和价值的扩大，机器可以处理海量的符号信息，但只有人才能将信息转化为意义，从而反过来指导实践。麦克卢汉将大众媒介和口头文化的兴起视为重新回到部落化的开端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将“整体的”与“综合的”生活混淆了，原始社会中没有主体与客体、感官与理性之分，人类的生活形态是整体的，大众媒介的兴起只能导致更高形态的综合，而不是重新回到神话语言的整体形态。

三、“信号”与“符号帝国”

对信号 (Signal) 和符号 (Sign) 的区分在恩斯特·卡西尔那里被视为人类认识能力的巨大飞跃，发明和使用符号被他视为人的本质特征。他的学生苏珊·朗格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区分，认为信号是一种由此物到彼物的直接代替，是直接面对自然的变化并做出的即时反映。符号与信号最大的区别在于，符号中增加了概念和逻辑的因素，因而成为人特有的能力。瓦尔德对符号与信号的区分除了借鉴这二人，还创造性地吸收了巴甫洛

^① Henri Wald, *Limbaǒ Şi Valoare*, Bucureş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1973, pp. 110-111.

夫(Pavlov)的“信号系统理论”。巴甫洛夫将自然中发出的可直接被动物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系统所感知的信号集合称为“第一信号系统”，而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即主要来源于语言及其带来的对逻辑、概念和意义的感知，被他称为“第二信号系统”。他认为，第二信号系统是对第一信号系统的抽象和概括，同时又对新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和综合，而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因素是语言^①，语言符号超越了信号反应的即时性和直接性，体现了人类创造力和适应能力的高度发展。

借助巴甫洛夫的理论，瓦尔德注意到，卡西尔和苏珊·朗格都已经认识到了信号的直接性与符号的建构性之间的区分，但他们将这种区分建立在人的认识和感知机制的基础上，以逻辑的有无将语言符号与艺术符号对立起来，同时将焦点放在情感符号上。这种观点忽视了语言在区分二者时所发挥的分界点作用，同时将语言与艺术、审美完全分离，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但是，瓦尔德也看到了巴甫洛夫“信号系统理论”的缺失，后者完全从生理学的角度阐释语言，无法就语言的意义、价值、社会性、历史演变等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瓦尔德引用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的观点——

^① 参见[苏]巴甫洛夫：《巴甫洛夫选集》，吴生林、贾耕、赵璧如等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9页。

“第一信号系统是在动物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过程中诞生的，第二信号系统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过程中，在人通过社会关系与自然的间接关系过程中诞生的”^①——重新将符号的产生放置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下，肯定了生产实践和交往行为在符号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在对符号与信号进行区分的基础上，瓦尔德敏锐地发现，现代社会的发展有从符号退化为信号的危险。

首先，符号退化为信号的危险表现在人们对符号的意义维度的忽视，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感官层面。信号是一种感官层面的刺激，但符号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它能够传达意义和价值，从而把人的意识从对待当下事物的直接反应中抽离，将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期待集中于当下。当今社会，这种符号化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远去。如果说符号化的生活方式是阅读、冥想和独白，那么信号化的生活方式就是观看、娱乐和享受，就是沉溺于感官刺激之中。将符号贬低为信号，就是沉溺于肤浅的表面而放弃对事物内在本质的追寻。大众媒介给予人们的是万花筒式的幻象和诱惑，它只允许人们接收这些感官刺激，产生情感上的本能反应，以满足人的欲望。人们在获得愉悦和快感的同时，驯顺地接受一种给定的

^① 转引自 Henri Wald,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ogic*, București: Editura Academiei, 1975, p. 77.

身份，主动放弃那种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度感知模式。由此，消费、娱乐和感官刺激代替了批判的符号意识，代替了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同时，符号退化为信号的危险表现在符号感知过程日益机械化和重复化，从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信息接收和本能反应。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亚当·沙夫（Adam Schaff）也对符号和信号进行了区分，他特别强调信号的约定性、临时性和使动性，认为“这种指号的目的是要唤起、改变或制止某人的某种行动”^①。对于日常交际来说，信号提高了效率，同时也增加了行动的灵活性。和沙夫一样，瓦尔德也认为信号与效率紧密相连，但他是站在对机械化和重复化的批判立场上来看待效率问题的，“令人眩晕的技术发展趋向于将精神意义简化为物理信号，将时间简化为空间，将历史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序列，而不是进化”^②。现代技术文明以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为目标，效率逐渐从一种生产要求转变为价值要求，成为衡量一切实践活动的标准，在效率面前，标准化、平面化的操作模式更具有可重复性，因而能够降低消耗，增加产出。符号与信号

① [波] 亚当·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3页。

② Henri Wald, *Homo Significans*,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1970, p. 74.

不同，对信号的理解是可以随意约定的，对符号的理解则需要通过教育、训练和文化熏陶，符号不仅负载着意义，而且这些意义随着历史社会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累积，因而符号存在多义性。信号则不同，它通过临时的约定确保指示行为的准确性和单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号比符号更适合机械时代对效率、准确性的追求。也正是这个原因，机器更多地是用信号作为内部运转的规则逻辑，电脑程序的基本行为语法是“如果 A 则 B”，即满足某种条件（信号）就执行某项命令。瓦尔德认为，这样一种信号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扩张性和侵蚀性，它使符号化思维方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导致符号世界日益转变为信号世界。

符号不仅面临退化的威胁，也面临无限增殖、无限膨胀，从而演变为“符号帝国”的威胁。在《人的意义》中，亨利·瓦尔德不无伤感地写道：“除了可怕的滔滔不绝，什么也看不到。个性、主体性和人的自由在符号网络的眼中流动……文化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符号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人消失了。”^① 在这里，他使用了“符号帝国”一词，目的是描述当今社会存在的符号无限增殖，同时日益肤浅化、平面化的状况。“符号帝国”

^① Henri Wald, *Homo Significans*,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1970, p. 30.

一词来自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同名著作。在这本书中，罗兰·巴特对日本文字和文化符号中的无深度特征激赏无比，他兴奋地写道：“在这个国度（日本）里，施指符号的帝国如此之广阔，它超过了言语的范围，乃至使符号的交换依然保留着一种迷人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微妙性。”^①在他看来，日本文字和其他日本文化符号（如饮食文化、装饰艺术等）普遍缺乏一个需要深度感知的现象—本质模式，它更像是一个辽阔无边的符号的延伸和展示。他使用“符号帝国”一词实际上是带着褒义的（至少是中性的），与“符号帝国”对立的是帝国霸权和中心、权力，而“符号帝国”内部指向的是多元、差异、美和自然。

但是，亨利·瓦尔德借用“符号帝国”这个词，却改变了其原意。他对罗兰·巴特对日本文字与文化符号的推崇不以为然，在瓦尔德看来，符号意义的空无以及这种“空符号”的大量涌现不过是一种混乱和迷失。感性能指与符号意义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个符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这个距离的存在，才使符号具有沟通过去与未来，代表不在场之物，表达人的价值判断的功能，距离越大表明符号的内涵越丰富，也表明人的创造潜能得到了更

^① [法]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2 页。

大程度的发挥。失去了这种距离也就意味着符号的意义和价值的丧失，符号便降格为信号，成为感官刺激追寻的猎物。由此，瓦尔德不再将“符号帝国”作为对日本文化的特指，而是指向当前时代随着消费主义和大众媒介的兴起而导致的符号泛滥的状态。这些符号的数量急剧增多，但缺乏意义和价值的深度，日益沦为对当下世界的感性反应。在这个“帝国”中，符号无处不在但又了无所指，其意义和价值连同人本身都失落了。

实际上，信号化与符号帝国可以看作符号在当代文化中急剧退化的两个征候，它们同时又是相互交织缠绕、互为因果的。一方面，符号的信号化使意义空间被无限压缩，因此个体差异性就必然向无限衍生，这是造成符号帝国的原因。另一方面，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领域的扩展也使符号泛滥，符号失去了深度，沦为扁平化、即时性的信号。瓦尔德并没有将这两者分开，在他眼中，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对创造性思维的放弃和对文化、价值的轻视。只有重新拾起这些被遗忘的东西，才可能解决语言符号的危机。

结 语

综上所述，亨利·瓦尔德从非理性主义、大众媒介和符号信号化三个角度出发，对当代社会的符号文化进

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瓦尔德看来，语言符号始终是人类理性与情感相互融合的领域，语言符号的危机从根本上是人的整体性生活的危机，走出这种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重新确立人的理性、情感、道德、审美之间更高层次的平衡。瓦尔德曾说：“诗歌不是符号的人工组合，而是通过语言媒介在思想中凝结的情感和激情。机器不能作诗，因为它们发生故障时不会受苦，在工作时也不会享受，因为它们错误时不会感到任何痛苦，在成功时也不会感到快乐，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对任何机器的最终优势在于其将焦虑不安的心理转化为观念的能力。没有机器能够提问，尤其是质疑、否认和创造。只有人类的思维才能怀疑、挑战和构想新事物。”^① 今天，亨利·瓦尔德所描述和批判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无论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还是回答 AI 时代“人是什么”的问题，他的思考对我们来说都不无助益。

^① Henri Wald, *Homo Significans*,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Română, 1970, pp. 105–106.